



商业保险、预防性储蓄与农民工消费

王军 金渝

摘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增加农民工消费又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潜力源。本文利用 2017 和 2019 年两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农民工商业保险购买情况对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商业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消费水平，且高于社会基本保险对其的拉动作用，商业保险的发展有利于破解“消费储蓄之谜”；②商业保险对农民工发展性消费的影响力度大于生存性消费，改善了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有利于实现消费升级；③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消费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参加商业保险对提高其消费水平特别是发展性消费水平的作用越大，发展型消费成为主要增长源；④在作用机制上，商业保险能够显著降低农民工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基于此，本文认为要想有效提振内需，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发挥其对社会基本保险的补充作用是一条有效路径。

关键词：农民工消费 商业保险 预防性储蓄 新发展格局

一、引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进行结构性调整，受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的影响，外部环境越发复杂，出口形势日益严峻，提高内需促进消费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

方面，而建立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则是关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同样提到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全面促进消费。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进一步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2021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 2.93 亿，约占总人口的 20.74%，农民工月收入为 4 432 元^①，按其每年平均务工时间为 10 个月计算，年收入约为 44 320 元，

王军（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金渝，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项目来源：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中国特色文明发展道路研究”（22ZDA108）；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城乡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2023 年度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CXZL202301）。

① 2022 年 4 月 2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 931 元，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 412 元接近^①。然而相较于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其消费水平却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异，农民工消费倾向平均只有 50%，城镇居民为 68%，其消费倾向比城镇本地户籍居民低 18%^②。由此可见，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且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探究其消费水平较低原因，寻求如何能增加其消费，对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 38.7% 远低于同期美国和日本的 68.4%、55.5%，而我国的储蓄率为 47%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26.5%，低消费、高储蓄一直是我国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由不确定性导致的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已成为居民储蓄意愿首位，居民储蓄中有一半以上都为预防性储蓄（甘犁等，2010；宋明月和臧旭恒，2016；Chio,H.et al., 2017）。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为预防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居民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以支付未来风险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开支。Hubbard et al. (1995) 在理论层面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很好地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相较于城市居民，由于制度、就业等因素限

制，农民工的职工、城市居民保险参保率较低，难以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保险对农民工而言存在着保费较低、异地报销困难等问题。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商业保险市场迅速发展，据银保监会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商业保险保费收入自 1980 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的 4.6 亿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4.49 万亿元，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李晓等，2021）。相较于社会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商业保险不受地域、户籍和工作性质等因素的限制与农民工的匹配度较高，但同时商业保险又具有相对较高的保费，可能会对农民工的当期消费造成一定的挤出。

基于此，本文将探讨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其是否能够通过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以为农民工群体低消费原因做出一定解释，并为增加其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消费的影响因素

探讨我国消费现状的文献主要是从经典消费理论和我国特殊国情两个方面为出发点，从经典消费理论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命周期和预防性储蓄假说。生命周

①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② 2018年8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出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十一次月度例会所发表的演讲。



期理论最早由 Modigliani (1954) 提出, 个体当期消费并不完全由当期收入决定而是与生命周期所处阶段有关, 个体会在年轻时储蓄以备年老时消费从而实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佳消费配置。但我国居民总消费并未随着中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上升,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 我国存在反生命周期现象, 即居民储蓄率和年龄之间呈“U形”关系(李蕾和吴斌珍, 2014), 竞争性储蓄、医疗支出风险等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杨继生和邹建文, 2020; 于淼等, 2021)。Leland (1968) 最早提出了预防性储蓄理论, 指出为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 人们将减少消费, 把剩余收入在储蓄和投资上进行分配以备不时之需, 未来不确定性越大, 当期消费越少, 预防性储蓄越多。由收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引起的预防性储蓄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率偏高消费较低的重要原因(雷震和张安全, 2013; 李成和于海东, 2021), 且由于现阶段我国医疗、养老等社会基本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 加剧了这一现象(凌晨和张安全, 2012; 姚东旻等, 2019)。也有部分学者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 认为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等影响形成的社会习俗、道德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约束, 自我控制力较强, 相较于其他国家存在消费率低的现象(黄少安和孙涛, 2005; 叶德珠等, 2012)。

关于农民工消费问题学者们大多是以其特殊社会背景为切入点, 从户籍制度、身份认同、代际差异等角度进行分析。身份认同感和市民化程度的提高, 以及获得

城市户口都能帮助农民工更快地并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对降低其未来收入、医疗保障和子女教育的不确定性起到显著作用, 从而提升其消费水平(钱文荣和李宝值, 2013; 金晓彤等, 2017; 王乙杰和孙文凯, 2020)。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文化、身份等方面的城市融入状况有显著提升, 使其在消费水平、结构上显著优于上一代农民工(王美艳, 2017; 钱泽森和朱嘉晔, 2018)。以上研究也大多从侧面印证了农民工消费水平较低是由收入不稳定、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福利待遇, 保障水平低等因素引起的。

(二) 社会保险对消费影响

上述研究对我国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工消费较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 可以看出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保障水平低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随着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学者们在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上进行了广泛研究。现有关于保险对消费影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且以城镇和农村居民两类研究对象为主, 臧文斌等(2012)利用2007、2008两年九个城市面板数据发现, 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使家庭的年非医疗消费支出提高了13%, 且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最大。白重恩等(2012)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得



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比未参加家庭约高 5.6%，且对低收入、健康状况较差家庭影响更为显著。甘犁等（2010）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核算得出，基本医疗保险的普及将会增加全国约 7% 的消费。赵青等（2018）通过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发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支出，且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显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生存型消费支出、缩小农村不平等程度（黄宏伟和胡浩钰，2018；周广肃等，2020）。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且对低收入居民作用更为显著，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相符，低收入群体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较大，会增加较多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保险对其带来的边际影响更大。

相较于基本医疗、养老保险，目前关于商业保险对消费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已有关于商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其购买因素上，居民金融知识水平、社会阶层、互联网使用情况等都对商业保险的购买有显著影响（秦芳等，2016；吴玉锋，2018；魏金龙等，2019）。在商业保险对消费的研究中，以省际面板数据为主，南永清等（2020）、许敏敏和兰晨阳（2021）分别采用 2003—2017 年、2013—2018 年省际面板数据发现商业保险对居民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城镇居民影响大于农村居民。我国大部分社会基本保险有着“保基本、低水平”的特征，由于需缴纳保费较低，所以保障水平也较低。有学者研究

表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由于缴费额低、保费低，对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十分有限（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相较于农村居民保险，城镇居民、城镇职工保险保障度较高，但由于其“不可携带性”和较少农民工在城镇正式部门就业导致的高门槛性，使农民工参保率较低（秦雪征等，2014；王晓宇和韩昱洁，2022）。商业保险近年来迅速发展，其保障范围广泛、灵活，可能成为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的有效补充，但目前关于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研究还较少。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17 和 2019 年两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并探讨其是否能够通过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有如下创新之处：一是本文探讨了商业保险对消费的影响，近年来商业保险迅速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基本保险的有效补充，但目前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社会基本保险对消费影响，对商业保险的相关研究较少；二是本文研究对象为农民工，农民工群体消费潜力巨大，如何拉动其消费是扩大我国内需的关键之一；三是本文实证检验预防性储蓄理论，即商业保险是否通过降低储蓄而提高了农民工消费，以期有力破解“消费储蓄之谜”。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西



南财经大学 2017、2019 年在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包括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数据，个人层面除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之外，同时也包括户籍、现居地、工作性质和商业保险购买情况等信息，家庭层面包括资产、收入和消费等数据，符合本研究的目的与主题。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民工，借鉴已有文献做法，调查对象满足工作性质为务农之外的其他工作，且其户籍为农业户口的，则认定为农民工（范丹和魏佳朔，2020）。本文在处理缺失值和剔除储蓄率小于 -1.5 和大于 0.8 的异常值共获得 24 406 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的家庭月人均消费，由家庭月总消费除以家庭人口计算得出，其中消费不包含家庭的医疗支出。同时本文为考察商业保险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设置了家庭月人均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两个变量。其中生存性消费包含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基本居住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发展性消费包括家庭旅游支出、教育培训支出和文娱娱乐支出（贾立和李铮，2021）。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农民工商业保险购买情

况，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养老保险任意一种或均购买赋值为 1，两种保险均未购买赋值为 0。异质性检验中加入了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赋值为 1，未购买为 0，商业养老保险同理。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预防性储蓄，相关学者研究发现由不确定所带来的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已居于居民储蓄意愿首位，居民家庭储蓄中有一半以上是预防性储蓄（甘犁等，2010；宋明月和臧旭恒，2016；Chio,H. et al., 2017）。所以本文选用储蓄率变量代理预防性储蓄， $\text{储蓄率} = (\text{家庭可支配收入} - \text{家庭消费支出}^{\text{①}}) / \text{家庭可支配收入}$ 并剔除储蓄率小于 -1.5 和大于 0.8 的异常值，以降低极端值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尹志超等，2020）。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大类。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社会保险购买情况和工作性质，工作性质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将临时性工作（有工作单位但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如打零工）、自由职业者定义为非正规就业，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定义为正规就业（王乾坤等，2023）；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月人均收入、未成年子

① 家庭消费支出包括食品、衣着、住房、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不包括耐用品和奢侈品支出。



女数(16岁以下)、家庭总资产。同时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独特性,本文还控制了流动距离,具体为市内跨县、省内跨市、跨省流动三类,分别赋值为1、2、3。最后为排除地域、时间因素的干扰,加入了农民工现居地省份及时间的固定效应。

(三) 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

首先为识别农民工商业保险购买情况对其消费影响,基准模型使用OLS多元回归方法,设定如下:

$$\ln(Y)_{it} = \alpha_0 + \beta_1 X_{it} + \gamma Z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ln(Y)_{it}$ 为因变量,农民工家庭月人均消费对数值; α 为常数项; X 为核心自变量“商业保险购买情况”; Z 为其他可能影响农民工消费的控制变量; β 、 γ 为回归系数,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μ_i 为地区固定效应, ε_{it} 为残差项。

2. 中介效用模型

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表明商业保险的购买能影响农民工消费并且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对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以预防性储蓄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用模型。中介效应的分析本文参考温忠麟(2004)提出的检验方法构建模型如下:

$$Y = cX + \varepsilon_1 \quad (2)$$

$$M = aX + \varepsilon_2 \quad (3)$$

$$Y = c'X + bM + \varepsilon_1 \quad (4)$$

其中, X 、 M 、 Y 分别为自变量、中

介变量、因变量。

检验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将 X 对 Y 进行回归,检验系数 c 的显著性,第二步 X 对 M 进行回归,检验系数 a 的显著性,最后把 X 和 M 同时对 Y 回归,检验系数 c' 、 b 的显著性。若 a 、 b 、 c 、 c' 均显著,且 $c' < c$,则说明 M 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若 c' 不显著,则说明 M 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四) 描述性统计

表1^①为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附表1为样本按照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养老保险进行分组,并进行组间差异检验。从附表1可以看出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有905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有868人,分别占总样本的3.71%、3.56%,参加商业保险的样本在月总消费、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上和未参加商业保险样本有较大差别,同时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以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为例分析比较。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农民工月均消费为4243.98元显著高于未参保农民工的2861.15元,其生存性、发展性消费分别为2985.38、783.52元也远高于未参保农民工的2172.83、399.99元,对发展性消费影响尤其显著,相差接近两倍。在个人特征方面,参保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未参保农民工,教育程度越高越会对未来的风险有进一步评估,并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规避部分风险。参保和未参保农民工

① 附表1~7见增强出版,中国知网—《金融市场研究》。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家庭月人均消费	家庭人均每月非医疗类总支出，取对数（元）	7.356	1.107
家庭月人均生存性消费	家庭人均每月食品、衣着支出、基本居住和交通通信支出，取对数（元）	7.089	1.089
家庭月人均发展性消费	家庭人均每月旅游、教育培训和文娱娱乐支出，取对数（元）	4.948	1.610
商业保险	有=1，无=0	0.064	0.244
商业医疗保险	有=1，无=0	0.037	0.189
商业养老保险	有=1，无=0	0.036	0.185
预防性储蓄	(家庭可支配收入 - 家庭消费支出) / 家庭可支配收入	0.153	0.511
性别	男性=1，女性=0	0.619	0.486
年龄	岁	41.984	11.968
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	3.084	0.792
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0.414	0.493
健康状况	差或很差=1，一般=2，好或很好=3	2.523	0.643
社会保险	有=1，无=0	0.906	0.292
工作性质	正规就业=1，非正规就业=0	0.399	0.490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人）	3.111	2.068
未成年子女数	家庭 16 岁以下成员数量（人）	0.736	0.868
家庭月人均收入	家庭月总收入 / 家庭成员数量，取对数（元）	8.015	0.981
家庭总资产	家庭总资产，取对数（元）	12.635	1.416
流动距离	跨县流动=1，跨市流动=2，跨省流动=3	0.353	0.881
样本数	人	24 406	

在健康状况并没有存在较大差异，相反购买保险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体较为健康，表明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存在自选择可能性较小。此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未婚率较高，可能是因为个人相较于家庭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所以青睐于商业保险。在家庭特征上，参保农民工家庭月收入为 6 409.15 元显著高于非参保家庭的 4 619.26 元，参保农民工家庭总资产均值为 1 183 120 元也显著高于非参保家庭的

674 430.8 元。此外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家庭规模较未参保家庭小。

四、实证分析

（一）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分析

附表 2 为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月人均总消费的影响及其对不同消费类型的回归结果。从模型 1 可知，商业保险在 1% 显著水平上对农民工家庭人均月消费存在正



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购买商业保险可使农民工家庭月均消费提高19.33%，对农民工消费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消费增加表明商业保险能够较大程度减轻农民工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而保费缴纳对消费的挤出较少，后文中介效用模型对此进行进一步地验证。从模型2、模型3可以看出，商业保险对农民工家庭月人均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同样在1%显著水平下存在正向影响。对比模型2、3的结果可知，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生存性消费增加15.69%，发展性消费增加达38.53%，对发展性消费的促进作用远高于生存性消费。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生存性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会降低。商业保险能够降低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的不稳定性，从而减少当期收入对未来不确定的储蓄，改变其以暂时性、维持性为特点的温饱型消费结构。

从个人特征来看，女性消费显著高于男性，且在发展性消费上表现尤为突出，表明女性农民工更加关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年龄对消费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年龄的上升，消费需求下降，而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上升。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消费越多，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增加其对未来收入水平和稳定性的预期，从而增加当期消费。健康状况对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对自身健康程度评估越高，应对疾病的预防性储

蓄越少，当期消费越高。社会保险购买对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比来看，社会保险对消费的促进效果却不如商业医疗保险。这表明在社会医保体系完善的同时，还需要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此外，正规就业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消费水平，改善其消费结构，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为农民工提供长效的收入保障，促进其消费。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规模对家庭月人均消费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家庭规模越大支出负担越重，消费越低，未成年子女个数对发展性消费影响更为显著，与预期相符，未成年子女个数越多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着养育小孩所带来的教育支出越多，可以看到相对于生存性消费，未成年子女个数对发展性消费影响更大。家庭月人均收入、总资产每提升1%，家庭月人均消费会相应增加0.27%、0.13%，与经济学基本理论相符，家庭财富和当期收入都是消费的基础，对消费存在较大的影响。此外，流动距离对农民工消费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流动距离越远对当地城市生活融入性更低，定居意愿越低（李瑞和刘超，2019），因此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为返乡做准备。

（二）内生性讨论——工具变量法

上述回归结果初步表明，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考虑到消费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购买商业保险，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经典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弱化



该问题。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选取地区层面的农民工商业保险购买率作为农民工个体购买商业保险的工具变量（吴庆跃等，2016；文乐等，2019）。一方面，一个地区的参保率反映的是该地区所有农民工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与农民工个体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地区层面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对农民工个体的消费行为没有直接的影响，保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附表3），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为160.312显著大于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此外，LM统计量p值为0.000，显著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进一步验证了地区参保率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从模型4、5可以看出，工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运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农民工购买商业保险依然在1%的水平上对其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通过工具检验后，商业保险的购买仍对农民工消费具有促进作用。

（三）商业保险对消费影响的内在机制分析

附表4商业保险对预防性储蓄影响的回归结果，对应中介检验的第二步。模型6的结果表明农民工购买商业保险能够显著地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由此验证了式（3）。式（2）已有附表2的模型1验证，接下来只需验证式（4）即可。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引入中介变量预防性储蓄，模

型7结果显示，预防性储蓄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家庭月人均消费。对比模型1、模型7，商业保险的系数从0.1933降到了0.1621，且在两个模型中都对农民工消费有正向影响，因此可得预防性储蓄在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商业保险能够通过降低农民工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其当期消费，同时进行bootstrap检验，也显示存在显著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6.14%。

（四）异质性分析

附表5为商业保险对消费影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模型8为家庭月人均消费较低的前25%的农民工样本回归结果，表明购买商业保险可使其消费增加15.84%。模型9、10分别为家庭月人均消费中间50%以及后25%的农民工样本回归结果，购买商业保险可使其消费分别增加17.66%、21.65%。这表明消费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参加商业保险对其前后消费差异越大。这可能是因为低消费群体的消费中大多是生存性消费，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又由于购买商业保险有一定的保费支出，有无商业保险不能改变其消费习惯。随消费水平提高，发展性消费比重增加，商业保险的保障作用能进一步提高其消费。

附表6中模型11、12分别考察了商业医疗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对农民工消费影响并加入了社会基本保险作比较。可以看出相较于社会基本保险，商业保险对农民工消费有着更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商业



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农民工未来面临的风险，在更高程度上为其提供保障。而新农合、新农保则分别对农民工消费没有显著作用及起到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新农合、新农保的保费较低、保障水平较低仅对低收入群体作用较为明显（白重恩等，2012；马光荣和周广肃，2014），而农民工还存在着异地报销等问题，所以新农合、新农保对农民工消费并没有促进作用，相反每年缴纳的费用可能使其减少当期消费（周佳璇和赵少锋，2022）。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本文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附表7）。①重新界定样本范围。剔除年龄大于60岁的农民工后进行回归，考虑到年龄较大农民工消费习惯、健康状况及对未来预期可能与其它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固将其剔除。剔除直辖市后进行回归，考虑到直辖市的特殊性，本文去掉现居地为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②缩尾后进行回归，本文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在1%的水平上的缩尾处理。通过模型13、14、15的结果可知，参数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消费储蓄之谜”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其他禀赋相同的

情况下农民工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其有着较大的消费潜力，为解答农民工低消费原因，以及如何才能有效促进其消费从而扩大内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2019年微观调研数据，探讨农民工商业保险购买情况对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影响，并分析了预防性储蓄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①购买商业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消费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购买商业保险使农民工总体消费水平提高19.33%，高于社会基本保险对农民工消费的拉动，对农民工消费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且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商业保险对消费水平越高的农民工促进作用越大。②购买商业保险能够改善农民工消费结构。购买商业保险使农民工生存性消费增加15.69%，使发展性消费增加38.53%。商业保险对发展性消费促进作用远大于生存性消费，提高了发展性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促进了农民工消费结构调整、优化。③购买商业保险可以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农民工消费，预防性储蓄在商业保险对消费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6.14%。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资产等变量对消费均有促进作用，性别、年龄、家庭规模、流动距离等变量对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二）政策启示

第一，积极推进商业保险发展，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本文研究表明商业



保险对农民工消费具有拉动作用,所以政府应继续加强对商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从而提高商业保险的信用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基本保险的补充作用,以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要把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低保障的现状与商业保险的灵活性、多样化相结合,探索推出针对农民工特征的商业保险,完善农民工的商业保险制度。通过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民工对未来养老、医疗及工作不稳定等顾虑,从而提高其消费水平。

第二,加强商业保险宣传力度。从样本来看,目前商业保险参与率较低,政府和企业应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进一步加强对

商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使人们更加深入了解商业保险的作用和优势,增加他们对商业保险的理解和信任,提高商业保险参与度,以形成政府保基本和市场高效率协同的保障体系。

第三,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促进其消费升级。应在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途径提升其就业质量,从而消除农民工的消费预算约束,建立让其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促进其消费升级。

[N]

学术编辑: 韦燕春

参考文献

- [1] 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2,47(02):41-53.
- [2] 范丹,魏佳翔.务工距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2015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0(06):59-70.
- [3] 甘犁,刘国恩,马双.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45(S1):30-38.
- [4] 韩俊强,梁元元.医疗保险参保选择与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21(02):33-42.
- [5] 黄宏伟,胡浩钰.“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8(05):18-26.
- [6] 黄少安,孙涛.非正规制度、消费模式和代际交叠模型——东方文化信念中居民消费特征的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2005(04):57-65.
- [7] 贾立,李铮.金融素养能改善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吗——基于农户参保行为的中介作用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1(10):64-78.
- [8] 金晓彤,韩成,聂盼盼.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03):18-30.
- [9] 李成,于海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调查(CFPS)数据[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36(06):31-50.
- [10] 凌晨,张安全.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理论与实证[J].管理世界,2012(11):20-27
- [11] 李蕾,吴斌珍.家庭结构与储蓄率U型之谜[J].经济研究,2014,49(S1):44-54.
- [12] 李瑞,刘超.流动范围与农民工定居意愿——基于流出地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9,292(08):53-67.
- 李晓,吴雨,李浩.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J].统计研究,2021,38(05):29-41.
- [13] 雷震,张安全.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研究: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3,36(06):126-144.



- [14] 马光荣,周广肃.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4,49(11):116-129.
- [15] 南永清,贺鹏皓,周勤.商业保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保险研究,2020(03):23-40.
- [16] 钱文荣,李宝值.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679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3(11):57-71.
- [17] 钱泽森,朱嘉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2011—2015年29省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06):74-86.
- [18] 秦芳,王文春,何金财.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6(10):143-158.
- [19] 秦雪征,周建波,辛奕,等.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以北京市农民工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4(02):56-68.
- [20] 宋明月,臧旭恒.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重要性的测度——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家,2016(01):89-97.
- [21] 宋月萍,宋正亮.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J].人口与经济,2018(03):115-126.
- [22] 王美艳.农民工消费潜力估计——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J].宏观经济研究,2016(02):3-18.
- [23] 王美艳.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与上一代农民工的比较[J].劳动经济研究,2017,5(06):107-126.
- [24] 王乾坤,张春华,侯冠宇.数字素养、正规就业与工资性收入——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OL].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2[2023-10-24].
- [25] 王晓宇,韩昱洁.农民工的医保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22,10(02):99-120.
- [26] 王乙杰,孙文凯.户口改变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微观追踪数据的证据[J].劳动经济研究,2020,8(02):68-100.
- [27] 魏金龙,郑苏沂,于寄语.家庭异质性、互联网使用与商业保险参保——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J].南方金融,2019(09):51-62.
- [28]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05):614-620.
- [29] 文乐,李琴,周志鹏.商业医疗保险能提高农民工消费吗——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19(05):81-96.
- [30] 吴庆跃,杜念宇,臧文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中国经济问题,2016(03):68-79.
- [31] 吴玉锋.社会阶层、社会资本与我国城乡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8(06):56-66.
- [32] 许敏敏,兰晨阳.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03):87-90.
- [33] 杨继生,邹建文.居民消费平滑及其结构异质性——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20,55(11):121-137.
- [34] 姚东旻,许艺焯,张鹏远.再论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预防性储蓄的决策机制和经验事实[J].世界经济文汇,2019,249(02):13-36.
- [35] 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等.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J].经济研究,2012,47(02):80-92.
- [36] 尹志超,刘泰星,张诚.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20(01):24-42.
- [37] 于森,高宇宁,胡鞍钢.中国家庭储蓄率反生命周期之谜——基于竞争性储蓄视角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03):33-42.
- [38] 臧文斌,刘国恩,徐菲,等.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47(07):75-85.
- [39] 赵青,李珍.基本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基于CHARLS数据的多层次线性回归分析[J].财政研究,2018(03):87-98.
- [40] 赵彤.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基于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03):77-85.
- [41] 周广肃,张玄逸,贾坤,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20,19(04):1467-1490.
- [42] 周佳璇,赵少锋.医疗保险可以提升农民工消费水平吗?——基于市民化意愿视角[J].消费经济,2022,38(02):74-85.
- [43] Chen B, Lu M, Zhong N.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J].World



Development,2015,70:133-146.

- [44] Choi H, Lugauer S, Mark N C. Precautionary saving of Chinese and US household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17,49(4): 635-661.
- [45] Leland H E.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2(3):465-473.
- [46]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Chapte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attempt at integration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edited by Kenneth Kurihara[J].1954.
- [47] Hubbard R G, Skinner J, Zeldes S P.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social insur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2):360-399.

Commercial Insurance, Savings and Spending by Migrant Workers

WANG Jun JIN Yu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Focusing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enhanc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major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ation. Increasing consumption by migrant workers is also an important potential source of expanded domestic demand.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s (CHFS) of 2017 and 2019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n consumption by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ir purchases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The study examines actual consumption levels,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forms of purchasing by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commercial insuranc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migrant workers and has a greater pulling effect on consumption than basic social insurance; ②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nt workers' consumption is also greater than that of survival-oriented consumption. This in turn improves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by migrant worker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③ The results of quantile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protective role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has gradually improved consumption by migrant workers; ④ Commercial insurance can also promote consumption by reducing the need for workers' precautionary saving.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commercial insurance should be actively developed to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in basic social insurance.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Spending, Commercial Insurance, Saving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JEL Classification G22 I38 J32